

政治转型并非从威权政府一步跳到民主政体，而必须谨慎渐进，有主次先后之分。只有社会资源和财富足以支撑民主竞争引发的各种交易成本，以及不同阶层民众形成若干基本共识之后，才可能摆脱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的双重阴影，真正实现政治现代化。

越是谋求彻底改变，越可能一无所有

## 中东政治转型需要超越“民主陷阱”

文/田文林

当前，随着中东剧变向纵深发展，中东维系多年的强人政权纷纷解体或根基动摇，政治转型问题日趋提上议程。那么，转向民主能否解决当前困境？中东政治转型究竟该往何处去？

### “强人政治”能量耗尽

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中东被称作“专制政体生态保护区”，意即威权政体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而强人政治在中东之所以广为盛行，是因为这类政体的产生有其历史进步性，起初都是在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意味着更宽的阶级代表性。

同时，由“强人”建立的“强政府”，最大程度提高了政权的有效性和执行力，缓解了此前广泛存在的政治衰朽和软政权化问题。因而在不少强人政权执政初期，经济发展成绩十分可观。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类政权的性质日渐发生变化。由于长期掌权，这类强人政权日渐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裁；由矢志清除腐败和无效率的进步力量，变成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变成腐败政治的维护者。

从上世纪50、60年代算起，中东强人政治已走过近半个世纪岁月，

其历史进步意义消耗殆尽，而弊端和历史阻碍作用日趋凸显。在经历了产生、发展、兴盛阶段之后，目前这类政权已到了衰败和灭亡阶段。而这次中东政局动荡，实际就是中东政治新陈代谢、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型过程。

### 民主并非解决中东难题的灵药

中东强人政治式微，意味着中东未来很可能会朝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但此举是否会给当地带来福音，答案就不那么简单了。

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约旦）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这一时期被称为“自由阿拉伯时期”）。但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各样深层次问题。由于阿拉伯社会发育不充分，使二战前的政权（包括殖民政权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权）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精英和大众间的对立和隔膜。在这些国家当中，基本都是国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权贵阶层独享权力资源，民主不过是其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方便工具。这些被西方津津乐道的民主政体，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据此不难理解为何在50、60年代，军人、强人政治会在阿拉伯世界大行其道。

在民主化导致国家衰败方面，尤以伊拉克的教训最为深刻。伊战前，萨达姆政权的主要问题是统治基础日益变窄，代表性不足，但该国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仍基本保留，政府仍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它并不是一种在社会懦弱衰败时的低级独裁。但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一上来就解散了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党，建立起所谓“西式民主”，这表面上使伊拉克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顾，但却极大摧毁了该国政府的有效性。目前，该国如一盘散沙，百废待兴，本来亟需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但美国为其设计的联邦政体和议会民主制，却使该国教派矛盾抬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如2010年3月大选后，僵持了8个月才勉强组建新政府。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而很难恢复原先地区强国地位。这种民主就是“坏民主”。

事实上，第三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先实现民主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恰恰相反，很多国家在推行民主化后，反而丧失了有效性，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强国。尤其在那些阶级分化对立严重、缺乏全民共识的国家，民主化的来临只会加剧“政治极化”，要么是民粹政治，多数中下层民众毫不留情地剥夺少数富人，最终

引发富人反抗，要么是金钱主宰选举，使民主变成为富人服务的寡头民主，从而面临被左翼军人政权推翻的危险。由于无法解决阶级问题，这种“翻烙饼”式的政治转型总是间歇性发作，引发第三世界的政治动荡与衰朽。

从世界范围看，在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大潮风靡第三世界，支持将民主作为政府体制的比例达到85%、90%甚至95%。但20多年后，由于大部分第三世界的民主体制运行得都不是很好，民主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在一些民主制国家里民主的支持率已下降到60%-65%，相当部分还降到50%。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对“强政府”的支持率却在上升，达到近50%。

冷静地看，政治转型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东政治运行有其内在逻辑。首先是宗派主义传统。在多数阿拉伯国家，部族、族裔、教派等传统因素，迄今仍是维系民众间关系的主要纽带，并使宗派主义在阿拉伯人观念中根深蒂固。这种传统使阿拉伯人形成了一种“同心圆式”的政治认同理念，其忠诚对象总是沿着“家庭一部族一部落联盟一国家”的方向依次外扩，越往外忠诚度越差，感情越淡漠，由此形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并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其次是集权主义传统。在阿拉伯世界，落后的生产方式铸就了一种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和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更易诱发个人专制和集权统治。

最后是现代国家意识。尽管“主权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非常短暂。但从当权者角度来看，强化国家

意识，对巩固权力、增强执政合法性至关重要。“议会”、“政党”、“宪法”、“总统”等体现现代国家特征的东西，可极大增强自身执政合法性，尤其可以理直气壮对境内其他部族、族裔、教派进行有效管辖。于是，那些能够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长期生存下来的“中东枭雄”，不管是昔日的萨达姆、阿萨德，还是现在的萨利赫、卡扎菲，几乎总是同时具备三副面孔，时而扮演部落酋长，时而扮演独裁者，时而扮演现代总统。他们真正的天赋，就在于能够不停地在这三副面孔间来回切换。

总的来看，“强人政治”似乎更适合中东的政治土壤。在实现“民主”没几年的伊拉克，不少人已经开始怀念萨达姆时代。这是否意味着阿拉伯政治转型在一轮民主化试验之后，将再度出现一轮强人政治潮呢？

### 政治转型如何走出恶性循环？

依笔者管见，评价政治转型成败，不是简单地看是否走向民主化（如全民选举、多党竞争之类），而是看这种变革是否富国强民，增强综合国力。因此，中东国家政治转型应遵循“两个有利于”：一，是否有利于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使政府决策真正体现多数民众意志；二，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两大标准缺一不可。

翻开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都是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实现强国的政治保障，在威权体制下完成了现代化。而最早实现民主的印度经济发展却十分缓慢。这说明，经济发展与民主并

非不能并存，但关键要看时机选择。

这种历史经验给第三世界政治转型的启示就是：政治转型并非从威权政府一步跳到民主政体，而必须谨慎渐进，有主次先后之分。一般应是先设法“做大蛋糕”，推动经济现代化，然后推进社会改革和公平分配，“分好蛋糕”，最大程度地消灭贫富差别，形成同质化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同时通过国族建构，培育民众的共同体感。只有在做好前两点铺垫，也就是既拥有足够资源和财富，足以支撑民主竞争引发的各种交易成本，以及不同阶层民众形成若干基本共识之后，才可能摆脱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的双重阴影，为真正实现政治现代化和国家富强铺平道路。

当前中东国家面临的是一场全面危机，其中既有经济不发达问题，也有分配不公平问题，还有政治不民主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当前的政治转型，更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应分出轻重主次和前后顺序。

如果无视这个规律，只盯着政治转型，尤其是只看是否实现多党制度和选举，而忽略经济转型和社会建设，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掉入新的“民主陷阱”——越是谋求彻底改变，越可能一无所有。当年的苏联、现在的伊拉克在转型过程中，都是急于从政治转型入手，将所有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体制问题，结果陷入万劫不复之中。因此，当前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能否在政治激荡后浴火重生，实现复兴自强，很大程度就是看其能否跳过“民主陷阱”，有序进行改革。■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